

# 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演变特征 与转化机理研究<sup>\*</sup>

邬璟璟，夏碧英

[关键词] 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六大核心制度关系；转化机理

[摘要] 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简称 SSA 理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在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有诸多贡献，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简称 CSSA 理论）则是利用 SSA 理论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本文基于 CSSA 理论将中国经济划分为计划 CSSA、转型 CSSA 和新时代 CSSA 三个时期，并分别分析了 CSSA 六大核心制度的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对 CSSA 的转化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从生产力角度看，不同 CSSA 的动力机制或者量化指标是经济增长，而从生产关系层面分析，CSSA 转化的质的标准在于 CSSA 六大核心制度关系是否促进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 邬璟璟，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夏碧英，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433）。

## 一、引言：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框架

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China'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简称 CSSA 理论），是指运用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简称 SSA 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所形成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框架。SSA 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其中心思想为长期的相对快速和稳定的经济扩张需要一个有效的，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即 SSA，<sup>①</sup> SSA 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处理和缓解资本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研究”（项目号：17AJL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Claude Diebolt, “Towards a New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002, 27: 85—99.

积累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为个别资本家提供投资利润率的稳定预期,从而促进社会总投资与资本积累。<sup>①</sup>更进一步地,该理论将这些矛盾归结为劳资矛盾、资本竞争矛盾、资本与社会的矛盾、国际矛盾、资本积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五大矛盾,而与这五大矛盾相关的制度构成了 SSA 的核心。<sup>②</sup>资本积累过程与五大矛盾的互相作用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推动了 SSA 阶段的演变,<sup>③</sup>而每一阶段的 SSA 内部演变包括探索、巩固和衰退三阶段。<sup>④</sup>

SSA 理论以五大核心矛盾的特征及其解决方式为依据来划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较好地解释了 SSA 阶段演变与资本主义长期繁荣和衰退相互更替的关系,为阐述经济长波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与此同时,SSA 理论注重多元化的发展,认为不仅需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 SSA,还需要研究转型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 SSA。科茨和韦尔(1997)首次运用 SSA 框架研究转型经济,对苏维埃模式和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sup>⑤</sup>此后,该学派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变革,运用 SSA 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变革的现实。

一是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探究。奥哈拉(2006)构建了评价 SSA 结构经济绩效与潜力的指标体系,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环境中,但也存在正反两方面制约因素。<sup>⑥</sup>麦克唐纳(2007)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成功模式有可能意味着一种新型 SSA 的出现,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sup>⑦</sup>科茨和麦克唐纳(2010)指出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 SSA 对中国的 SSA 有一定影响,但仅限于社会福利体系规模的缩小和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中国主要通过积极的宏观政策、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体系国有化等措施和制度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sup>⑧</sup>李民琪(2016)则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维持高速增长,是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sup>⑨</sup>

二是应用 SSA 理论对中国经济具体制度和个别经济问题的研究。科茨和韦尔(1997)认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危险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提出应运用 SSA 理论研究中国问题,重视投资制度和对外出口制度。<sup>⑩</sup>李钟瑾等通过构建 SSA 框架分析了中国工人的现状。<sup>⑪</sup>张沁悦和麦克唐纳(2014)则

①④ David M. Gordon, Richard C.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6—27, p. 170.

② Terrence Mc Donough,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A 'Punctuated' View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2011, 70 (5): 1234—1247.

③ David M. Kotz, "Long Wav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A Critique and Reinterpret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7, 19 (4): 16—38.

⑤⑩ David M. Kotz and Fred Weir, *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Routledge, 1997, p. 233, p. 199.

⑥ Phillip A. O'Hara, "A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for Capitalist Long Wave Upsw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6, 38 (3): 397—404.

⑦ Terrence Mc Donough, "The Marxian Theory of Capitalist Stages",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2007, 24: 241—280.

⑧ David M. Kotz and Terrence Mc Donough, "Global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SSA", in Terrence Mc Donough, Michael Reich and David M. Kotz (e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5.

⑨ Minqi Li, "Endless Accumulation, Limits to Growth, and the Tendency for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6, 7 (2): 162—181.

⑪ Zhongjin Li and Hao Qi, "Labor Proces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in China",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 46 (4): 481—488.

将资本积累与生态变化的矛盾运动纳入 SSA 分析框架, 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sup>①</sup>

三是运用 SSA 理论对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下的调整和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科茨提出 2008 年的危机不是经济周期性的衰退, 而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 如果经济继续停滞不前, 中国也将很快被卷入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之中。<sup>②</sup> 科茨和麦克唐纳也将 2008 年金融危机看作一个重要的断点, 认为中国经济中日益增多的结构性失衡, 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部门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部门之间的矛盾, 中国政府在危机之后的快速反应虽然防止了衰退, 但加剧了非均衡。<sup>③</sup>

以上研究对于 SSA 理论中国化做出了较大贡献, 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 SSA 理论的初衷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革, 其诸多基本概念并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经济, 因此, 能否对该理论进行更加系统的中国化发展, 继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SSA 理论, 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 我们早在 2013 年就开始探讨<sup>④</sup>并尝试建立 CSSA 理论框架, 现已形成如下理论成果:

第一, 依据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调整了传统 SSA 理论中的“资本”和“资本积累”等概念。传统 SSA 理论中的“资本”是指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 “资本积累”即资本价值的增加。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资本为基础, 在一定时期允许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并存。为此, 应当对“资本积累”的概念进行新的解读, 即一是资本价值的增加, 二是 GDP (产品和服务) 的增长, 三是社会资本和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 且在 CSSA 不同时期, 可以采用上述不同定义。<sup>⑤</sup>

第二, 明确 CSSA 阶段更替的动力机制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CSSA 不再将阶级斗争作为阶段演变的着眼点, 虽然其分析框架仍然重视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分析传统, 但是, 在分析 CSSA 阶段更替的动力机制时应更多考虑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 特别将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作为 CSSA 演变的动力基础。

第三, 提出了 CSSA 阶段划分不同于传统 SSA 理论的指标与原则。基于上述两点, CSSA 将经济增长的变化作为 CSSA 阶段划分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 CSSA 阶段划分也注重以下六大原则, 即资本来源、劳动力的来源、资本和劳动的结合方式、需求的来源及其结构、政府政策的阶段演变特征和原因、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sup>⑥</sup>

第四, 将 SSA 的五大矛盾框架扩展为六大矛盾。针对全球生态危机对资本积累的制约和影响, 将生态矛盾纳入 CSSA 理论的核心框架中, 并简称为 SSSA (可持续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 理论, 从而在保持传统 SSA 五大核心制度条件下, 增加一个新的制度关系, 统称六大核心制度。<sup>⑦</sup>

第五, 对 CSSA 的阶段演变进行了初步划分。根据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轨迹, 将新中国的 CSSA 划分为三个时期, 分别为 1949—1978 年的计划 CSSA 阶段、1978—2012 年的

① 张沁悦、特伦斯·麦克唐纳:《全球生态变化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

② David M. Kotz,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isis of Over-investment”,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3, 45 (3): 284—294.

③ David M. Kotz and Terrence Mc Donough, “Applying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to China”, at Regulation Theory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Paris Diderot, June 12, 2015.

④ 2013年, SSA 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卫·科茨 (David Kotz) 和特伦斯·麦克唐纳 (Terrence McDonough) 与中国 SSA 理论研究者 (马艳、张沁悦等) 组成研究团队, 开始研究 CSSA 理论。

⑤ 以上观点由特伦斯·麦克唐纳 (Terrence McDonough) 在“中国 SSA 理论研讨会 (中国上海, 2014)”上提出。

⑥ 该观点由大卫·科茨 (David M. Kotz) 在“中国 SSA 理论研讨会 (中国上海, 2014)”上提出。

⑦ 马艳、王琳、张沁悦:《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创新与中国化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

转型 CSSA 阶段<sup>①</sup>、2012 年至今的新时代 CSSA 阶段。<sup>②</sup>更进一步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CSSA 阶段更替细分如下：

表 1 CSSA 阶段划分

计划 CSSA	探索期	1949—1956
	巩固期	1956—1966
	衰退期	1966—1978
转型 CSSA	探索期	1978—1992
	巩固期	1992—2008
	衰退期	2008—2012
新时代 CSSA	探索期	2012 至今

尽管 SSA 中国化的探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CSSA 的基本理论也已经形成。但是这些研究尚处于初步探讨阶段，对 CSSA 理论的充分分析、对 CSSA 制度特征的系统阐述以及对 CSSA 转化机理的揭示，均需要作出更加深入的探索。为此，本文在对 CSSA 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创新性探索的基础上，沿着新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轨迹，分别对三个 CSSA 阶段的六大核心制度演化过程和基本特征进行系统描述和分析，并着重对 CSSA 的转化机理进行深入探讨。

## 二、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路径与核心制度演变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 1949—1978 年的计划 CSSA 阶段、1978—2012 年的转型 CSSA 阶段以及 2012 年至今的新时代 CSSA 阶段。这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正是基于中国资本关系、劳资关系、政府角色、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生态关系这六大核心关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核心制度的演变特征。

### （一）中国资本关系的演变脉络

资本关系是所有制结构变革的直接体现，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就伴随着资本关系从多元到一元，再从一元到多元，并逐步趋于结构良性化的演变过程。

第一，计划 CSSA 时期（1949—1978 年），我国资本关系经历了从多元向一元演化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一元化的公有资本关系。1949 年新中国成立伊始，资本关系是多元的，并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使得国民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从 1953 年我国公布了“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至 1956 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国实现了从多种经济成分向单一公有制经济的过渡，一元资本关系初步形成。此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已经消失，一元的资本关系正式确立，并在后续 20 年间持续巩固。

① 科茨和麦克唐纳（2015）将 1978 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市场社会主义 SSA（1978—1992）”“延续了部分制度的新资本主义制度 SSA（1992—）”。该观点由科茨和麦克唐纳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在巴黎召开的“经济转型，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改革”会议中提出，这两个阶段的英文表述分别为“Market Socialism SSA”和“New Capitalist Institutions with Some Institutions from Previous SSA”。

② 马艳、王琳、杨培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学术月刊》2018 年第 10 期。

第二, 转型 CSSA 时期 (1978—2012 年), 我国从一元公有资本向多元资本逐步演化发展, 并确立了公有资本为主体、多元资本并存的资本关系。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 这种改革首先体现在对资本关系的调整, 使得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 初步形成了以公有资本为主的多元资本关系。1992 年中国进一步明确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 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使得中国进入全面市场化改革, 多元资本关系也获得了迅速发展。

第三, 新时代 CSSA 时期 (2012—), 我国由多元的资本关系转向结构优化的良性资本关系趋向。进入新时代,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聚焦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另一方面则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同时也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自此, 中国的多元资本关系进入混合发展阶段, 形成了公有、私有和混合资本三足鼎立的格局, 同时也预示着一一种结构优化、比例均衡的良性资本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 (二) 中国劳资关系的演变脉络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变迁, 中国的劳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即当所有制经历由单纯公有制再到公有制为主体的变化过程, 中国劳动力也经历着由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人逐步演化为或“半工人半农民”、或“半主人半雇佣劳动者”、或“半国人半外国人”、或“单纯雇佣劳动者”的过程, 使得中国的劳资关系呈现出由单纯劳动关系逐步转化为复杂劳资关系的变化特征。

第一, 计划 CSSA 时期 (1949—1978 年), 中国的劳资关系表现为单纯的劳动关系。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以及计划配置资源的条件下, 中国企业内部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劳资冲突, 仅有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包括, 中国农村的“剪刀差”现象所形成的农村对城市的长期补贴效应, 引致了农村劳动者与城市劳动者的利益差别; 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劳动成果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 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劳动成果归集体 (部分) 劳动者所有, 继而形成不同公有制形式之间劳动者的利益非均衡性; 以及公有制内部劳动者个人收入的差别导致的利益非均衡性等。

第二, 转型 CSSA 时期 (1978—2012 年), 中国经历从“单纯的劳动关系”逐步转化为“复杂的劳资关系”的过程。在这一时期,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关系的改革以及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使得单纯的劳动关系逐步复杂化, 形成了囊括半工半农、半主人半雇佣劳动者、半国人半外国人以及单纯雇佣劳动者的多元劳动者队伍。其中, 1978—1992 年期间, 中国的复杂劳资关系逐步形成, 劳资矛盾尚不明显; 1992—2008 年期间, 农民工与各类资本的复杂关系已经形成, 国有企业工人已经商品化且与公有资本之间的劳资关系已经确立, 私人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劳资关系也大量涌现, 劳资冲突日益凸显, 这是复杂劳资关系的最终形成时期。2008 年以来, 中国劳资冲突更加复杂化, 并逐步趋向于社会化, 劳资矛盾这些新变化, 预示着转型 CSSA 进入衰退期, 新的 CSSA 即将产生。

第三, 新时代 CSSA 时期 (2012—), 中国进入由“复杂的劳资关系”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和谐劳动关系”的阶段。2012 年以来,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 从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 中国的劳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 即要逐步建立更加平衡、更加“以人民为中心”的和谐劳动关系。

## (三) 中国政府角色的演变脉络

中国 CSSA 的演变也是政府由“高度集权”到“有控制地放权”, 再到“适度控权”趋向的演变过程, 且在整个过程中, 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始终没有弱化, 这是 CSSA 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一, 在计划 CSSA 时期 (1949—1978 年), 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政府呈现出高度集权的特征。政府的这一高度集权特征主要体现在: (1)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建立了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2)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推行“一大二公”和刮“共产风”；(3)在1961年，中央决定将经济管理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中央，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高度集权。此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始终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尽管曾有部分权力下放的举措，但均局限在形式上，政府的行政管制并未减少。

第二，转型 CSSA 时期（1978—2012 年），中国政府由“高度集权”转变为“有控制地放权”的政府。转型 CSSA 的形成与中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的举措密不可分，即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完全放权，而是“有控制地放权”。放权体现在，中央在宏观经济制度层面不断简政放权，在财税制度层面先后进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税制改革等举措，在企业制度层面逐步对国有企业进行“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分类指导”“抓大放小”“国退民进”“战略重组”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等。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放权也是有控制的，即虽然中国公有资本占比不断下降，但是公有资本在关系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基础性行业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且中国政府始终把握着改革过程中制度创新的方向，推行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

第三，新时代 CSSA 时期（2012—），中国政府角色方面由“有控制地放权”转向“适度控权”。2012 年以来，中国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尤其是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所处的角色也将逐步向以人民满意为导向的“适度控权”特征转变。

#### （四）中国意识形态的演变脉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和波动，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绝对主流”到“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动态博弈”再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过程。

第一，计划 CSSA 时期（1949—1978 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绝对主流的意识形态形式。这一时期党的文件和媒体宣传均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党的指导性，此外，这一时期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对部分渗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大多予以批判。

第二，转型 CSSA 时期（1978—2012 年），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处于动态博弈状态。1978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绝对主流的意识形态格局被逐步改变，开始出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动态博弈。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学术研究、高校教育、企业管理等各方面的影响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做出积极和坚定的回应，通过诸多措施调整和控制“西化”之风，使得这一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处在“西化—整顿—再西化—再整顿”的动态博弈过程中。

第三，新时代 CSSA 时期（2012—），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由“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动态博弈”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2 年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为此，中国的意识形态将从“动态博弈”逐步转变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导。

#### （五）中国国际关系的演变脉络

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经历了从“弱国”到“强国与弱国并存”再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和强国地位”的身份转变，从而 CSSA 也经历了不同阶段。

第一，在计划 CSSA 时期（1949—1978 年），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上处于绝对的“弱国”地位。这一时期，中国进行了部分对外开放的尝试，如积极开展与苏联、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利用港澳地区的特殊性同西方国家建立贸易联系等，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刻意封锁、中苏关系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等多方面原因，中国的外贸总额在波动中有所增长，但在 GDP 中的占比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进出口总额占比呈现相对较快的增长，但基数水平仍相当低，且对外贸易仅定位为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与上述对外开放程度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绝对“弱国”地位，经济总量仍处在世界较低水平。

第二，转型 CSSA 时期（1978—2012 年），中国在国际上具有“强国与弱国并存”的双重身份。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此后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加入 WTO，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伴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总量呈现快速增长，在国际关系中逐渐形成了“强国与弱国并存”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与非洲、印度、拉美等发展中弱国相比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强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均拉开不小差距；但另一方面，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国际规则、引导国际舆论、引领国际前沿等方面仍缺少话语权。

第三，新时代 CSSA 时期（2012—），中国的国际角色由“强国与弱国并存”转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和强国地位”。近年来，中国始终致力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同时积极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体现出中国国际关系特征的转变，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大国和强国成为未来中国国际关系方面的重要标签。

#### （六）中国生态关系的演变脉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经历了从“潜在隐性”到“显性激化”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演变过程，这与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改革和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计划 CSSA 时期（1949—1978 年），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潜在隐性”特征。这一时期，由于公有制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资源利用和保护上具有计划性，国有企业与国家整体利益具有一致性，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的保护。而且，中国处于农业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工业化水平十分低下，尽管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单位生产过程污染较高，但整体而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仍处在生态自然循环足以消化的范围之内。虽然，由于人们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大炼钢铁”“以钢为纲”的生产方式也对生态环境带来负担，但这些矛盾仍处于潜在累积时期。

第二，转型 CSSA 时期（1978—2012 年），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逐步呈现“显性激化”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程度均呈现跨越式发展，但这一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使得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步显性化。另外，中国环保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形成了一种相对运动，使得生态矛盾快速从隐性转为显性，并不断趋于表象化。

第三，新时代 CSSA 时期（2012—），中国的生态关系由“矛盾显性激化”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2012 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极为重要的战略层面，并多次强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生态理念，而且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也更加严格。这必将促使中国的生态关系逐步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综上可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劳资关系、资本关系、政府角色、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生态关系均显示出了明显的阶段性演变特征，正是这些特征的演变标志着 CSSA 的动态演变。即在 CSSA 的探索期，六大制度关系的特征相互加强、不断稳固，推动 CSSA 进入巩固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相对稳固的 CSSA 与生产力发展之间逐渐出现矛盾并不断累积，使得六大制度关系的特征也



出现改变,伴随着这一变革过程,旧 CSSA 进入衰退期,同时一个新的 CSSA 开始探索形成。

### 三、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的转化机理研究

我们根据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CSSA 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 CSSA 的六大核心制度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解析,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CSSA 六大核心制度的动态演化过程,同时也证实了中国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的主导性对于 CSSA 的变迁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

然而, CSSA 不断转化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也就是为什么一个 CSSA 会转化为一个新的 CSSA,并且每个 CSSA 都会经历探索、巩固和衰退三个发展阶段?

基于前述理论分析,我们认为旧 CSSA 更替为新 CSSA,以及每个 CSSA 的探索、巩固和衰退的划分的量的指标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而其质的判断标准则在于六大核心制度是否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如果六大核心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表明这个 CSSA 进入了巩固阶段,如果六大核心制度阻碍了经济增长,则表明这个 CSSA 进入了衰退或者危机阶段,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 CSSA 将产生。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是 CSSA 演化的根本原因,或者称之为动力源。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是划分 CSSA 的基本量化指标和动力机制。

分析图 1 可以发现,自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果剔除 1959 年到 1962 年的特殊情况<sup>①</sup>)总体有一个不断增长达到一个高点,然后不断下降的变化轨迹。为此,根据这一量的指标,我们可以判断这一时期为一个 CSSA。由于这一时期我国主要实行计划经济,为此,我们称之为计划 CSSA。这中间我们根据经济增长的变化率,可以看出 1949 年到 1956 年是探索期,然后剔除三年特殊时期,自 1962 年开始经济增长率逐步提高,直到 1966 年达到一个最高点,为此,我们确定这一时期为计划 CSSA 的巩固期。自 1966 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减缓,虽然中间有些波动,但是,直到 1977 年仍处在较低点。据此,我们认为,这一时期计划 CSSA 进入衰退期或者危机阶段,它已经不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需要产生一个新的 CSSA 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

从图 1 我们也可以看到,1978 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回升,剔除 1989 年中国政治风波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短期波动外,一直在不断上升,特别是自 1992 年后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率,直到 2008 年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这一下滑过程持续至 2012 年。我们据此判断,这个 CSSA 的周期为 1978 年到 2012 年,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处于转型阶段,即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为此,这个新的 CSSA 称之为转型 CSSA。转型 CSSA 的探索期实际从计划 CSSA 的衰退期就应该开始,<sup>②</sup>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确定 1978 年为其探索期的开始,在这一时点前后,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回升。剔除短期波动,我们可见自 1992 年到 2008 年中国有一个平稳的经济增长时期,说明转型 CSSA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好的促进作用。而 2008 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这说明转型 CSSA 开始进入衰退期,当转型 CSSA 不能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时,就需要一个新的 CSSA 来替代这个转型 CSSA。

<sup>①</sup> 图 1 表明,中国 GDP 增速在 1959—1962 年间出现短期下滑。其主要原因,一是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二是中苏关系紧张,三是政府主导思想一度失误。此后政府及时调整后经济增长迅速恢复。

<sup>②</sup> 因为旧 CSSA 的衰退期和新 CSSA 的探索期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并没有明显的界桩,往往一个旧 CSSA 的衰退期恰好是一个新 CSSA 的探索期的开始,为此,两个 CSSA 的交替时必然有重合,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本文在不同 CSSA 划分时,还是选择一个确定的时点。



我们称最新的、当前的 CSSA 为新时代 CSSA, 其探索期应该从 2008 年就开始, 因为此时转型 CSSA 已经无法有效地支撑中国经济增长, 需要进行 CSSA 的更替, 以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因分析方便之故, 我们将 2012 年作为新时代 CSSA 真正意义上的探索期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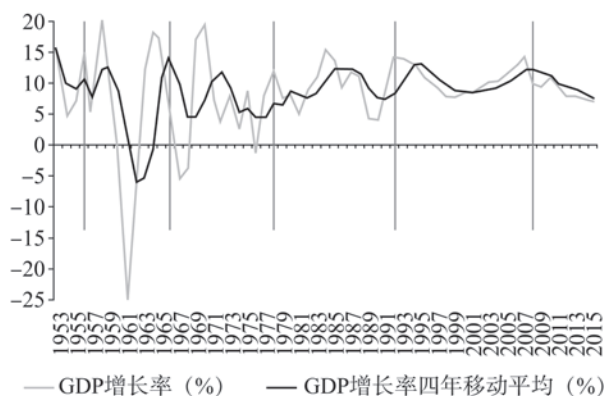


图1 1953—2015年中国GDP增长率四年移动平均(%)

数据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系 2016 年 7 月最新修订的 GDP 增长速度数据, 该 GDP 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具体参见网页: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7/t20160705\\_1373924.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7/t20160705_1373924.html)。

另外, 根据前文的分析, 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作为 CSSA 的转化动力机制, 具有政府主导性特征, 也就是 CSSA 的转化是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推动的。诸如计划 CSSA 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创新型经济制度。转型 CSSA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并激发中国经济内在活力的制度变迁产物。而新时代 CSSA 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新理论和新制度的探索。

其次, CSSA 六大核心制度的变迁是 CSSA 演化的内在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是判断 CSSA 转化的量化指标和动力源, 但是, 这仅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考虑 CSSA 的转化机理, 从生产关系也就是从制度层面来分析该机理, 则必须要进一步考察 CSSA 六大核心制度在 CSSA 转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果一个 CSSA 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就说明这一 CSSA 的核心制度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 反之则是不适应或阻碍经济增长。中国三个 CSSA 的演变过程, 恰好反映了 CSSA 核心制度不断适应和不适应经济增长以及动态调整过程, 这就是 CSSA 转化的内在原因。

计划 CSSA 是自 1949 年开始, 至 1956 年完成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后, 由探索期进入了巩固期, 这一时期, 经济增长剔除特殊的波动后, 呈现较快速的发展态势。这是因为计划 CSSA 的六大核心制度较好地适应了经济增长的需要, 主要体现为: 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确立后, 整个社会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计划经济的设想, 建立起了公有制经济的绝对主体地位。这就使得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主人, 劳动关系较为和谐, 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高涨。然后通过政府计划经济的统一管理, 推行了低利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价格等措施, 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加之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不突出, 以及苏联一度的支持, 中国才实现了较高的资本积累率, 带来了经济逐步的增长。

1966 至 1978 年是中国经济增长下降时期, 也是计划 CSSA 的衰退期, 这是因为中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计划 CSSA 的核心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出现问题, 比如这场“革命”使得主流意识形态更加教条化和僵化, 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以此为指导, 在资本关系方面就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 将“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形式是否先进的标准, 在利益分配方面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 结果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抑

制了企业的内在活力，加之长期的闭关锁国，中国经济增长最终进入长达十年的衰退期，可以说中国经济处在了崩溃的边缘。长期的经济增长下降，促使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已经无法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寻找一个能够推进经济增长的新的经济体制。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于新 CSSA 的探索，真正意义上的新 CSSA 探索期，应是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大会的基本主题就是要对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按照当时的话语体系就是要转型，即新的 CSSA 为转型的 CSSA，至于这个改革方向是什么，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则需要探索。为此转型 CSSA 经过几年的探索，直到 1992 年，中国政府终于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之转型 CSSA 也就进入了巩固期，表现为转型 CSSA 六大核心制度已经形成，并对于经济增长产生了有效的影响作用，图 1 显示，1992 年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拐点。

计划 CSSA 到转型 CSSA 的转型过程中，六大核心制度演变的着力点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诸如出现了资本关系多元化、劳资关系复杂化、意识形态博弈化、政府行为放权化、国际关系多角色化、生态矛盾显性化等新变化。这就使得意识形态和政府行为不再教条化、僵化和高度集权化，使得资本与资本之间可以形成竞争关系，使得资本与劳动关系有了内在压力和外在约束，使得国际关系更加开放，使得生态环境可以获得较好的治理和保护，从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推动力，使得中国经济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转型 CSSA 在运行过程中也不断地累积了一些矛盾，一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占据上风，影响着转型 CSSA 核心制度的运行方向；二是在市场化过程中资本竞争也出现了恶性循环；三是非公经济的发展，私人资本相对劳动日益强势，劳资矛盾激化并逐步社会化；四是政府行为的有效性和服务功能不强；五是在国际竞争中更多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愈加不平等；六是中国长期的高投入、高能耗、高速度的增长模式破坏了生态环境，矛盾逐步凸显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之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转型 CSSA 六大核心制度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阻碍了经济增长。为此，转型 CSSA 进入了衰退期，一种新的 CSSA 也就应运而生。

2012 年前后，中国政府积极主动探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模式，例如，2014 年做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论述，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系列新措施；2017 年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些表明新时代 CSSA 已经来临。

#### 四、结 论

本文在对 CSSA 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创新性探索的基础上，沿着新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轨迹，分别对三个 CSSA 阶段的六大核心制度演化过程和基本特征进行系统描述和分析，并着重对 CSSA 的转化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如下结论：

1. 通过对 SSA 中国化的探索，将 CSSA 的内涵作出了新的界定，将其动力机制确定为政府主导型的增长，将其核心制度结构由五大制度关系变为六大制度关系，即分别为劳资关系、资本关系、政府角色、意识形态、国际关系以及生态矛盾。
2. 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轨迹和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路径，将新中国 CSSA 划分为三个时期，即 1949—1978 年的计划 CSSA、1978—2012 年的转型 CSSA、2012 年以来的新时代 CSSA，并对每个 CSSA 的探索期、巩固期和衰退期进行划分。
3. 用 CSSA 理论分别对于计划 CSSA 到转型 CSSA 六大核心制度的演化特征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较为深刻的分析，即劳资关系从“单纯的劳动关系”转为“复杂的劳资关系”；资本关系从“一元的

资本关系”转为“多元的资本关系”；政府角色从“绝对集权”转为“有控制地放权”；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绝对主流”转为“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动态博弈”；国际关系从“弱国”转为“强国与弱国并存”；生态矛盾从“潜在隐性”转为“显性激化”。

4.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将当下的新 CSSA 称为新时代 CSSA，将其内涵概括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并将其六大核心制度关系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和谐劳动关系”“结构优化的良性资本关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革民生的适度控权政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推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和强国地位”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

5. 对于 CSSA 的转化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从生产力角度看，划分不同的 CSSA，即 CSSA 从探索期进入衰退期，旧 CSSA 演化为新 CSSA 的动力机制或者量化指标是经济增长，提出在中国这一经济增长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从生产关系层面分析，判断 CSSA 演化的标准则在于 CSSA 六大核心制度关系是否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如果六大核心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表明这个 CSSA 进入了巩固阶段，如果六大核心制度持续阻碍经济增长，则表明这个 CSSA 进入了衰退或者危机阶段，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 CSSA 将会产生。

##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Wu Jingjing, Xia Biy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Key words]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six core institutions; evolution mechanisms

[Abstract]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or SSA theo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chool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t economics, and has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nomic theories.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or CSSA theory)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views form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SSA theory to China's practices. Based on CSSA theory, the paper divides Chinese economy into three periods: Planned CSSA, Transitional CSSA, and New Era CSSA,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six core institutions or relations in these CSSAs.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of evolution of CSS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it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ynamic mechanism or quantitative indicator of evolution of CSSAs is economic growth; whi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essential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CSSA evolution lies in whether the six core institutions or relations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 陈翔云]